

(此為尚未發表之初稿，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由「棕狗傳奇」論二十世紀初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策略之激進化

The radicalization of strategy of the British Anti-vivisection Movement in the “Brown Dog” affair¹

本文藉由環繞著一隻棕狗的傳奇，探討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於策略上之激進化現象。文章首先回溯此一歷時十年以上之爭議，並藉之分析其運動策略演變。本文指出，反動物實驗運動儘管經常被指控為一由情緒與非理性所支配之運動，但是我們若將分析焦點置於其策略理性面，即可見出其與時俱變、有意識之策略運用。此時期策略上之三大發展—媒體策略、美學策略、群眾策略—皆充分回應且利用了時代政治文化之特色乃至物質文明之變遷，包括新媒體之出現、廣告概念與政治文化之結合、女性對集會遊行文化之突破等。透過對反動物實驗運動之策略分析，我們可見出其與激進政治傳統間之密切關聯及其策略理性。

“Histories, then, are not only about events but also about the possible sets of relationships that those events can be demonstrated to figure.”—Hayden White²

一、前言

這是一隻連名字都沒有的棕色小狗的故事，也是英國動物保護運動史上少數晉身成為「傳奇」、至今仍被傳頌不已之故事。若是談到二十世紀初之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必然得提及此一曾受活體實驗的棕狗，而環繞其一系列的事件，也支配了此時期運動之論述與主要發展。這已然成為一文化象徵的棕狗，自然也成為一個詮釋競爭之場域，不同之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觀點，述說此一故事。³

這反動物實驗運動當中最熱鬧精彩的一頁，雖然廣泛流傳於大眾記憶以及通俗著作中，在學界專論中，卻僅有卡羅·蘭絲伯利（Carol Lansbury）的《老棕狗》一書。⁴在這本結合了心理史學與文學分析的著作中，蘭絲伯利雖然對棕狗事件做了頗為詳細之事實重建，但其最終目的乃是欲藉之彰顯動保人士潛意識所暗藏之參與動機。蘭絲伯利認為，此時運動中為數眾多的婦女與工人對棕狗之聲援，皆非出自對棕狗或是被實驗動物的真正關懷。在這「表面形式的建築結構之下」，流著的是「一條非常黑暗的河流」，這條暗流，一邊受色情文學所牽制，一邊受傳統醫療慣習所網綁。⁵透過對十九世紀通俗小說與色情文學以及婦產科學的分析，作者指出婦女在這些場域中看到了自身處境，解剖台上的動物，如同色情文學中被騎、被虐被網綁女子之形象，也如同新式婦科醫學檢驗下婦女難堪的跨坐與裸露，而在恐懼之中，實則混雜著慾望。蘭絲伯利甚至指出，部分婦女之所以被吸引參

¹ 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動物實驗，由於主要為生理學研究中的活體解剖，因此反對者多以解剖（vivisection）一詞統稱所有以活體動物為對象之實驗，反動物實驗團體亦皆以 anti-vivisection 為名。惟此一用語並不表示反動物實驗者僅僅反對活體解剖，他們一般反對所有會帶給動物痛苦之實驗，包括使用注射、灌餵或控制實驗環境（如改變溫度、真空化）等侵入與非侵入性程序而帶給動物痛苦之實驗。今日英美反動物實驗團體名稱中尚有 vivisection 一詞者，乃源自此一十九世紀用語，亦應作如此廣義理解，尤其二十世紀下半期以降，因動物實驗內涵不斷擴充，動物實驗一詞亦更進一步包括了動物行為研究、產品測試（animal testing）、基因改造等主要類別，而這些議題，亦皆為反動物實驗團體所關切。本文為避免用辭所可能造成之誤會，因此一律將 anti-vivisection 譯為「反動物實驗」而非「反動物解剖」。

²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his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81-100, at p. 94.

³ 各具立場之通俗著作或評論，參閱 Edward K. Ford, *The Brown Dog and His Memorial* (London: St. Clements Press, 1908); J. H. Baron, “The Brown Dog of University Colleg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Sept. 1, 1956, pp. 547-8, 548; (Unsigned), “A New Antivivisectionist Libellous Statue at Batterse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March 1986, p. 683; Walter Gratzler, *Eurekas and Euphorias: the Oxford Book of Scientific Anecdo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7-190; Peter Mason, *The Brown Dog Affair: The Story of a Monument that Divided the Nation* (London: Two Sevens Publishing, 1997); Keith Mann, *From Dusk ‘til Dawn: An Insider’s View of the Growth of the 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 (London: Puppy Pincher, 2007), pp. 40-41; Hilda Kean, “The Mood of Militancy,” *BBC History*, Dec. 2007, pp. 36-38.

⁴ Carol Lansbury, *The Old Brown Dog: Women, Workers, and Vivisec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⁵ Lansbury, *Old Brown Dog*, p. 22.

與運動，乃是「出自一種被虐之慾望，希望如他們所見的解剖台上的動物一樣被制伏、被給與痛楚。」⁶而工人則除了在通俗文學如探討倫敦馬匹處境的《黑神駒》(Black Beauty; 1877)中，見到與自己同樣是社會結構下之受害者，也對兼有研究功能的新式醫院高度存疑，擔心自己也將是繼動物之後下一個科學祭壇上的犧牲者。故不論是婦女或是工人，他們所關心的並非動物之真實命運；棕狗於是成為如噱頭般的「一個宣傳故事」(an advertising story)，投射了運動者自身之命運、慾望、偏見與恐懼。作者雖謙稱此書並非一部運動史，卻也還是給運動下了個結論，認為這終非在意動物福祉之現象，正解釋了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之失敗。

對於一種詮釋，尤其是對難以實證方式檢驗之心靈詮釋，我們雖無法以「是非對錯」論之，但是，當多數史家選擇以此視角分析運動時，則可能產生整體研究之偏頗。⁷比如說，刻意迴避運動者之自我宣稱及語言論述，忽略運動推展過程之高度理性和策略導向等面向，終而賦予運動整體一負面非理性形象。

本文無意正面駁斥此類心理解釋，卻希冀藉由環繞棕狗、長達近十年的一系列事件，述說另一個有關運動之策略理性面的故事。我將運動策略置於二十世紀初大眾文化興起之社會脈絡及激進政治運動之「行動劇碼」(repertoire of action)傳統中，探討運動與時代環境以及政治改革文化間之關聯。在重新敘說這由棕狗擔綱主角的故事後，我將逐一探討此時運動如何利用棕狗議題，結合大眾時代之各項宣傳元素如通俗媒體、視覺政治與群眾遊行等方式，推動運動整體目標之實現。有別於蘭絲伯利之呈現，本文將聚焦於理性意圖強烈之策略運用面，希冀展現該運動與時俱變之有效策略運用及二十世紀初另一波行動高峰與高昂戰鬥力，這對棕狗事件和運動之不同詮釋，或許就如同棕狗這文化符碼，在不同人們心中所代表之意義必然多元，亦將彼此競長。

二、話說棕狗傳奇...

動物，通常是進不了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歷史敘事的，但是，在一個偶然機緣中，一隻不知名的倫敦大學實驗室中的小棕狗，在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卻掀起了偌大社會波濤。如同多數歷史現象，此一棕狗事件不單是歷史因緣際會(historical contingency)下之產物，亦是眾多人們發揮其能動力(historical agency)、步步為營所創造出來的產物，而這背後推動之力量，無非是英國持續近一世代的反動物實驗運動。⁸其中主角之一，乃是出身瑞典顯貴家族、受英國貴族教育、最後劃歸為英國公民、並且成為英國著名動保領導人之傳奇女子—露意絲·琳達·哈格比(Louise Lind-af-Hageby, 1878-1963)。

當巴斯德的細菌理論於1880、1890年代起帶起醫學研究之重大進展時，⁹哈格比在與好友麗莎·夏道(Lisa Shartau)同行的一次巴黎之旅中，如同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訪者，懷抱著仰慕之心來到「巴斯德研究中心」。此次參訪，讓她們意外見證了動物實驗之殘酷，於是在返回瑞典後，她們即刻成立了「瑞典反動物實驗協會」，由哈

⁶ Lansbury, *Old Brown Dog*, pp. 127-128.

⁷ Lansbury, *Old Brown Dog*, p. 3. 蘭絲伯利之心理解釋，並非動保運動史書寫上的孤立現象，此領域具類似傾向之著作另可見 R.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in Victorian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此類心理解釋，不但存在於史學界，亦常見於早期社會科學的社運研究中。此類解釋之過度盛行，促使七零年代後出現了聚焦在運動組織、策略、資源運用等理性運作面向之各類社運員理論，參閱 L. Zurcher and D. Snow, "Collective Behaviour: Social Movements," in R. H. Turner and M. Rosenberg, eds.,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441-482; J. C. Jenkin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9 (1983), pp. 527-553; B. Klandermans and S. Tarrow, "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in B. Klandermans, H. Kriesi, and S.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88), pp. 1-40; M. M. Ferree,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Rationalit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A. D. Morris and 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9-52.

⁸ 關於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參閱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N. A. Rupke ed., *Vivis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S. Richards, "Drawing the Life-Blood of Physiology: Vivisection and the Physiologists Dilemma, 1870-1900," *Annals of Science*, 43 (1986), pp. 27-56; 李鑑慧，〈十九世紀英國動物保護運動與基督教傳統〉，《新史學》，20：1 (2009)，頁 125-179。

⁹ 參閱 Michael Worboys, *Spreading Germs: Disease Theories 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 Worboys, "Was There a Bacteriological Revolu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8 (2007), pp. 20-42; John Waller, *The Discovery of the Germ: Twenty Years that Transform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Disea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格比擔任榮譽執行長。

1902年，為深入了解更多動物實驗內幕，哈格比與夏道註冊進入「倫敦女子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for Women)，取得在倫敦其它醫學院觀摩動物實驗教學之機會。她們認真旁聽了大約五十場動物實驗課程，並且將每場示範細節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而就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她們遇見了這隻讓她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棕狗。

在事後對棕狗的敘述中，她們提到，她們比其它學生都還更早抵達講堂。她們先仔細觀察了這隻被綁在解剖台上的動物。此時小狗身上已有多處傷口，脖子上還有一割口露出腺體，上面還插著管子，肚子中央有一傷疤，上面有手術鉗，旁邊還有五、六處傷疤。她們沒有聞到乙醚或是氯氣的味道，而這隻狗顯然處於痛苦之中，不斷曲著背、踢腳掙扎著。她們據此推論這隻狗並沒有被麻醉，並且曾經遭受實驗。她們並且記錄，在講課之時，操刀的倫大教授威廉·貝里斯(William Bayliss)似乎對狗兒的痛苦無動於衷，一邊漫不經心操作著施放電流的儀器，一邊抽著煙斗；當他談到過去一些實驗經驗時還一邊開著玩笑，引發課堂不斷的歡笑聲，「歡樂」(Fun)於是也就成了第一版棕狗故事之章節標題。¹⁰

不久後，這兩位學生將課堂觀察筆記交給了英國當時最大的反動物實驗團體「全國反動物實驗協會」(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後簡稱NAVS)秘書長史蒂芬·柯立芝(Stephen Coleridge)。就在1903年5月NAVS的大型年會上，柯立芝選擇了將棕狗遭遇公諸於世。依照英國於1876年通過的動物實驗管制法，未施打麻醉且重覆於同一動物上實驗是違法的。此消息一經媒體披露，立即廣受評論。為保全聲譽，貝里斯教授迅即向法院提告，控告柯立芝毀謗。¹¹ NAVS也並不退縮。長年支持各類動保議題、此時亦為NAVS核心幹部的恩斯特·貝爾(Ernest Bell)，也立刻由其貝爾家族出版社(G. Bell & Sons)將兩位學生的課堂筆記完整出版，書名取為《科學屠宰場》(The Shambles of Science；1903)。

1903年11月，此一著名學府教授和英國著名反動物實驗團體間的官司終於展開，並且迅速成為媒體焦點。法庭上，貝里斯教授堅稱他那日的實驗僅是以電流刺激唾液腺體，以觀察腺體分泌與血壓間的對應關係，過程僅有三分鐘，並且非如被告所宣稱，是在非麻醉狀態下所進行；數名當日上課的學生亦於庭上做證，表示未見棕狗掙扎或有痛苦徵狀。¹²在數天的審判中，雙方陣營劍拔弩張，尤其在法庭中，大批倫大醫學院學生聚眾叫囂，頻頻干擾法庭秩序，屢經法官勸阻也沒用。

經過數天的開庭，法官判決被告所提證據不足，因此誹謗罪成立，柯立芝被判五千鎊的罰金和訴訟費。司法案件雖然終結，但是更為激烈的多起棕狗暴動，卻才正要上演。棕狗雖死，但卻成了意涵更為豐富之象徵和圖騰，凝聚了新一波、不管是捍衛或是反對動物實驗的抗爭。¹³

在「國際反動物實驗會」(Inter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Council; IAVC)之秘書伍沃德女士(A. L. Woodward)的奔走下，1906年9月，在倫敦南部以激進政治著稱的貝特希(Battersea)市中心的一繁忙交通路口廣場旁(Latchmere Ground)，這隻飽嚙折磨的小棕狗，化做一尊莊嚴傲立的高大銅像。

問題是，貝特希區議會為何願意接下這必然會招來更多風暴的燙手山芋？原來貝特希位於泰晤士河以南，是一個低收入戶區，亦以工會主義、共和主義、愛爾蘭自治和普選權爭取等激進政治理念而馳名全國。受當時社會主義者所推動的「市鎮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理想所驅動，包括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工黨人士等各類進步份子(Progressives)等，紛紛將地方議會視為是落實各類政治理念的最直接管道，積極投入地方

¹⁰ 參閱 L. Lind-af-Hageby and L. K. Shartau, *Shambles of Science: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Two Students of Physiology* (London: Animal Defence and Anti-Vivisection Society, 1914, 5th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 Bell and Sons in 1903); "The Vivisection Case. Case for the Defence," *Daily Graphic*, Nov. 18, 1903, p. 5.

¹¹ "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 *The Times*, May 4, 1903, p. 15.

¹² "The Vivisection Case. The Plaintiff Cross-Examined," *Daily Graphic*, Nov. 14, 1903, p. 13.

¹³ 關於科學界與醫界支持動物實驗者之動員，參閱 Nicolaas Rupke, "Pro-vivisection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1880s: Arguments and Motives," in Rupke ed., *Vivis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149-187.

自治工作。

在貝特希地區，自 1890 年代中期，進步份子已取得議會主導權，推動頗具開創性的各類福利方案，如免費澡堂、便宜電力、體育館、閱覽室、濟貧措施，以及透過公共建設創造具優渥勞動條件的工作機會。這些市政創舉曾引起全國廣泛矚目，貝特希甚至亦被《泰晤士報》略帶嘲諷地封為「市政麥加」(The Municipal Mecca)。¹⁴此外，貝特希地區亦出現了幾位全國性知名激進政治運動領導者，如 1889 年領導倫敦碼頭工人罷工的約翰·伯恩司(John Burns)和領導激進派女子投票權爭取運動並因長年奉獻地方事務而有「貝特希之母」稱號的夏洛特·戴絲帕(Charlotte Despard)等，這些政治人物皆增加了貝特希地區之知名度並且強化了其政治激進與強悍形象。¹⁵而自十九世紀末起，動保運動亦已開始與政治激進傳統建立各項連結，逐步吸納各類政治激進論述，積極將平等、正義、權利等概念加以延伸運用於動物倫理議題上，擴充了運動原始所主要仰賴之基督教道德基礎。在此意識形態之激化現象中，許多世俗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女性主義者亦紛紛投入動物捍衛運動，而貝特希的許多激進政治成員，更為運動添增新血。貝特希另外兩個重要地標——「貝特希流浪狗之家」(Battersea Dog's Home)以及以不聘用從事動物實驗之醫師的「反動物實驗醫院」(The Anti-Vivisection Hospital)——亦清楚標幟著此地居民在動物議題上的屬性。這些地方特色，都讓貝特希地區的進步議會和多數居民，似乎在這一場棕狗之戰中，理所當然地成為棕狗銅像的最佳守護者。

1906 年 9 月，在倫敦大學大學學院採取法律行動之威脅下，¹⁶貝特希區議會依舊為棕狗銅像展開盛大揭幕典禮。有著工會背景的貝特希市長萊恩斯(W. Rines)、戴絲帕以及數位區議員都參加了這場盛會。萊恩斯市長特別提到區議會雖然承受了百般壓力，但依堅持理念豎立此一銅像。顯然預知著可能來臨之風暴，他呼籲所有在場人士往後當棕狗銅像面臨威脅時，都能義不容辭地擔任起棕狗守護者。¹⁷確實，在往後數年當中，貝特希的居民幾乎無論男女老少，大多扮演了棕狗的捍衛者角色。

回到這尊銅像本身。銅像高七呎，環繞四周的是馬車尚未完全被機動車取代前、英國街頭隨處可見的供人與動物飲水之飲水池。在銅像上，刻寫著棕狗身前最後的遭遇：

紀念於 1903 年 2 月死於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實驗室的一隻棕色獵犬。牠在生前承受了超過兩個月的解剖實驗，由一實驗室被轉往另一實驗室，直到死亡使其解脫。同時也紀念 1902 年在相同實驗室被解剖的 232 隻狗。英國的男女們，這樣的事情，還要存在多久呢？¹⁸

在區議會的安排下，這銅像還被通了電流，若受攻擊，警方可即刻收到通報前往處理。¹⁹

1907 年 11 月 20 日，在一個降著濃霧的倫敦夜晚，倫大醫學生李斯特(W. L. Lister)帶領一群學生，打算除去這礙眼的銅像。可惜這些揮著笨重鐵鎚的學生，馬上便被便衣警察包圍，十人當場被補，隔日以阻礙交通與妨礙警察執行勤務為由判處罰鍰。法官保羅·泰勒(Paul Taylor)並警告若再犯，將判處兩個月徒刑，並不得易科罰金。隔日，心有不甘的學生們聯合了倫敦地區其它醫學生上千名，在市區遊行示威。他們喊著「打倒棕狗」、「打倒保羅·泰勒」等口號，當遊行至校門口時，甚且為當時倫大生理學系主任、同時亦為棕狗的第一位實驗者恩斯特·史特林(Ernest Starling)高聲歡呼，遊行最後並在泰晤士河畔以焚燒法官之塑像做為活動結束之高潮。

20

往後的一個月，倫敦各地區其它小型抗議不斷。11 月 30 日，上百名年輕人再度於半夜在市中心萊斯特廣場

¹⁴ "Municipal Socialism in 'A Municipal Mecca,'" *Times*, Sept. 18, 1902, p. 12. 另參閱 Patrick Loobey ed., *Battersea Past* (London: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2002), pp. 101-102.

¹⁵ 戴絲帕是貝特希區議會貿易委員會、早期工黨成員及「婦女自由聯盟」(Women's Freedom League)的領導者。

¹⁶ "Valuation Committee,"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the Metropolitan Borough of Battersea*, Jul. 11, 1906, p. 109.

¹⁷ "An Anti-Vivisection Monument," *The Times*, Sept. 17, 1906, p. 10; "Monument to a Dog," *Daily Chronicle*, Sept. 17, 1906, collected in *Battersea Scraps*, Battersea Archives, Battersea Library, London.

¹⁸ "Notes and Notices," *Zoophilist and Animals' Defender*, Jan. 1910, pp. 133-134, at p. 134.

¹⁹ "A Protest in Marble. Unique Memorial to a Dog," *Lloyds*, Sept. 16, 1906, collected in *Battersea Scraps*.

²⁰ "The Police Courts. The Students' Demonstration," *Times*, Nov. 27, 1907, p. 18; Ford, *The Brown Dog and His Memorial*, p. 7.

(Leicester Square) 等地喧鬧示威。三名醉醺醺的獸醫系學生揮舞著一隻愛爾蘭獵狗標本，沿途敲打路人，最後因喝酒鬧事、干擾警方執勤之罪名而被捕。12月10日，趁著牛津劍橋學生年度足球賽來到倫敦時，李斯特再籌劃了一場大型示威，數百名學生繞著市區，舉著棕狗肖像，反諷地喊著「棕狗萬歲」(Brown Dog! Hurrah!)，或喊著「打倒棕狗」、「打倒保羅·泰勒」。警方出動約四百人對付這些喧鬧的學生，12人被補。²¹在1907年醫學生抗議高潮之際，醫學生並經常造訪貝特希銅像，當地警方除了嚴陣以待，全天候守護，有時貝特希青年亦加入保衛戰局。有一次，當上百名醫學生前往抗議時，這些青年甚至以泥巴球和街頭垃圾伺候，將這些醫學生弄得滿身汗穢與爛泥、鐵羽而歸。²²

在這些不管是純粹喧鬧或抗議遊行中，學生還將此時流行的一首民謠「小茶壺」(Little Brown Jug) 改編為「小棕狗」(Little Brown Dog)，傳唱不停：

天色暗後，我們的步伐
領著我們來到了拉契米爾公園
我們驚見
一隻小棕狗，佇立此地還撒著謊

哈哈！嘻嘻！
小棕狗，我們恨你。
哈哈！嘻嘻！
小棕狗，我們恨你。

如果我們有隻狗也說瞎話
對準他的肋骨，我們將揮鞭
教訓牠，我們不會手軟
因為他撒了天大的謊
哈哈！嘻嘻！
小棕狗，我們恨你...²³

當然，面對學生的挑釁，不管是貝特希居民或是反動物實驗運動也都不甘示弱，舉辦多次棕狗捍衛大會。²⁴但這些會議也經常受到學生各式各樣的干擾如叫囂、高歌、放鞭炮等而難以順利進行。之後，於類似會議上，主辦者乾脆註明醫學生不得參加，但學生們依然有辦法矇混入場或爬窗進入。為了應付這些醫學生，動保團體也開始在會議中安排糾察隊以維持秩序，但這卻經常反而引發更激烈的衝突，有時甚至以打群架收場，或是被控使用不當暴力。1908年5月，支持動物實驗的「研究捍衛會」(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RDS) 於《泰晤士報》披露，有三名醫學生僅因於會議中「大聲鼓掌」，就被數十名糾察隊員粗暴毆打，其中一位甚至必須就醫。²⁵

面對支持動物實驗陣營之不滿和一連串的抗議與暴動，貝特希區議會也相當頭痛，嚴肅考慮著是否乾脆移除此一銅像。醫學生曾多次說明，他們並不是對銅像有意見，而是對銅像上之碑文有意見。1908年2月，倫敦大學有1035名學生向區議會連署陳情，要求將碑文上的「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字樣除去。²⁶要求移除碑文者還

²¹ "The Police Courts. Students' Demonstration," *Times*, Dec. 12, 1907, p. 15.

²² "The Brown Dog Riots," *The Daily News*, Dec. 11, 1907, quoted in "Home Intelligence," *Zoophilist and Animals' Defenders*, Jan. 1908, p. 152.

²³ Ford, *The Brown Dog and His Memorial*, p. 3.

²⁴ "The Brown Dog. Meeting at Battersea," *Times*, Jan. 11, 1908, p. 6.

²⁵ The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The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Times*, May 16, 1908, p. 17. 陸續回應參閱 Miss M. M., "The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Times*, May 19, 1908, p. 12; Mr. Lister, "The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Times*, May 21, 1908, p. 2.

²⁶ "Valuation Committee,"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the Metropolitan Borough of Battersea*, Feb. 12, 1908, p. 372.

包括了貝特希警方，因為為了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保護銅像以及維持地方秩序，警方每月得支付超出預算之龐大人力費用。²⁷

1910年3月，區議會在多年來歷經無數次討論後，終於以42比4之票數，通過決議，拆除棕狗銅像。²⁸向來支持棕狗的區議會會做出此一決議，原因無它，只因議會代表不久前改選，社會主義等進步派勢力失勢，棕狗於是失去政治後援。

或許唯恐夜長夢多，早上決議甫通過，當晚，在夜色掩護下，區議會的工人立即動工移除這五年來引起滿城風波、遠近馳名的棕狗銅像。隔日清晨，當貝特希居民一早起來見到銅像早已不在，想要搶救已為時已晚。

然而，已然成為一象徵符號的棕狗，並不因銅像銷毀而失去其影響力，在此之後，環繞其爭議亦絲毫未減，相關集會、遊行、筆戰、官司等，依然輪番上演，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20世紀初運動戰鬥力之揚升

面對棕狗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議與暴動，後代讀者最大之疑問或許是，一隻連小名、品種、性別與年紀都不詳的棕狗，怎麼會引起偌大社會爭議？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回歸英國反對動物實驗運動之發展脈絡。

時至二十世紀初期，反動物虐待運動存在英國已近百年，而引起更大社會矚目的反動物實驗運動亦已喧騰近三十年。1876年，英國通過世界第一個管制動物實驗之法律，建立有關動物實驗之登記、管理與稽查制度。基於對動物倫理之考量，法令規定欲使用活體脊椎動物從事實驗者，必須向內政部提出申請，取得個人以及實驗室之年度執照，並且不定期接受稽查。實驗者必須證明其實驗有助於知識發展，不能僅以操練刀法為目的，且必須使用麻醉劑減少動物受苦。然而實驗者若能證明其必要性，依然能夠取得特殊執照而不必施行麻醉，且若有必要亦能於教學中從事動物實驗。²⁹這個法令始終被反動物實驗組織認為過於寬鬆，形同保障了實驗者，而非實驗動物。於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遍及英國各主要城鎮的組織屢次於國會中推動替代法案，企圖全面廢止動物實驗。³⁰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這些立法嘗試皆宣告失敗。十九世紀末，部分動保團體於是開始權衡「全面廢止」之可行性，運動於是有了立場上的分裂，分別有NAVS以及哈格比於1909所成立的「反動物實驗與動物捍衛聯盟」（Anti-Vivisection and Animal Defence League；ADAVS）所代表的短程「管制」、長程「廢除」之立場，以及「英國廢除動物實驗協會」（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BUAV）所代表的即刻「全面廢止」立場。³¹這兩派各有相當支持者。1900年，NAVS於英國共有24分會和隸屬團體，BUAV也迅速擴張，1903年時有15分會，1912年有49分會。另一頗具影響力、支持全面廢止立場的「倫敦反動物實驗協會」（London Anti-Vivisection Society；LAVS）於1895年亦有7分會和隸屬團體。³²

就主張而言，管制與廢止似乎代表著「溫合」與「激進」之兩方，但主張管制者未必同意此一區別，因為

²⁷ "Law and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the Metropolitan Borough of Battersea*, Jan. 22, 1908, p. 347.

²⁸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the Metropolitan Borough of Battersea*, Mar. 9, 1910, pp. 439-440.

²⁹ 參閱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pp. 143-144.

³⁰ 1876年至1884年間，反動物實驗陣營每年皆於國會中提出全面廢止動物實驗之法案，參閱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p. 164.

³¹ 相關路線之爭，參閱 Stephen Coleridge, *Step by Step. Being a Reply to a Pamphlet by Miss Frances Power Cobbe, Entitled—'Why We Have Founded the British Union for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 (London: NAVS, 1898); "Letter from the Hon. Stephen Coleridge to the Editor of 'The Zoophilist,'" leaflet inserted in *The Zoophilist*, May 2, 1898.

³² *Zoophilist*, Feb. 1, 1900, backcover; *Abolitionist*, 4 (1903-4), p. 67; Emma Hopley, *Campaign against Cruelty: the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the 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 (London: BUAV, 1998), p. 12; *Animals' Guardian*, Nov. 1895, p. 33. 相對於反動物實驗運動，支持動物實驗之科學社群較無高度發展之組織與草根性，其所選擇之訴求對象多為國家與政府而非一般社會大眾，其所從事之工作亦多為針對國會與政府單位進行遊說，或以其專業身分爭取擔任內政部之諮詢對象，藉以確保實驗社群之利益。二十世紀前葉，其相關主要代表團體僅有三個：「生理學會」（Physiological Society; 1876年成立）、「醫學研究促進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ine by Research；AAMR）及「研究捍衛協會」（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1908）。是以當醫學生起而表達對於反動物實驗者之不滿時，多為自發性行動，很容易帶給旁觀者一種缺乏組織與統一訴求、徒然製造混亂的印象。實際上，學生不滿情緒與不滿意見之表達和各種喧鬧抗議，亦應視為抗議運動策略中之「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其各種議事干擾行為，實為英國政治集會文化之普遍現象，並為傳統所接受之異議表達方式。關於反動物實驗陣營訴諸大眾、而支持動物實驗陣營之訴諸於國家之分析，參閱 Martin Willis, "Unmasking Immorality: Popular Opposition to Laboratory Science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in David Clifford, et al., *Repositioning Victorian Sciences: Shifting Centr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Anthem Press, 2006), pp. 207-250. 關於英國政治文化中之「干擾政治」傳統，參閱文章（五）之部分。

他們自認更為切合實際，並宣稱並不放棄完全廢止之長程目標。此外，這類主張上的現實考量，未必代表著行動與策略上之溫和。相反地，環繞棕狗一系列事件的主導者，正是持管制立場的NAVS與ADAVS。或許如柯立芝所自稱，支持管制目標，並不代表妥協，而是「步步為營」(step by step)，每一項局部改革，都是朝著完全廢除的踏腳石。³³

在二十世紀初期，管制派的主要運動目標，乃是修正 1876 年的法令。在他們的分析中，這項法令充滿各種問題，包括對麻醉種類和施用方式之規定不明確，對教學示範管制不夠嚴格，對特定實驗程序界定和管制規定過於模糊，並且若無內政部長之書面同意，無法對違法科學家提出訴訟等。在執行上，運動團體同時也指出稽查員嚴重不足，形同虛設。比如說，在 1903 年，英國內政部僅指派兩位稽查員，而他們必須負責視察全英國 319 位領有執照之實驗者的 14,906 次的活體動物實驗。³⁴而在執照申請的審查上，英國內政部也益發仰賴科學社群之人士。1882 年，生理學界組成了「醫學研究促進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ine by Research; AAMR)。這團體除了提供動物實驗者各項諮詢並指導其申請執照與負責監督國會相關法案之推動，其後甚至成為內政部非正式的諮詢小組，部分人員並直接擔任執照審查工作，這也就形成了動保團體所批評的球員兼裁判現象。

若要修正這些問題，一是推動修正法案，二是召開如 1875 年的「皇家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Vivisection)，針對這二、三十年來的動物實驗以及法令執行狀況做出完整調查，以之做為國會修法或內政部修正執行辦法之依據。由 NAVS 所領導之管制派，分別在 1903 年、1906 年於國會提出管制版法案，各團體也積極配合宣傳，為促成第二次皇家調查委員會而努力。1906 年，在棕狗事件所引發的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終於決定召開第二次皇家調查委員會。此次調查歷時六年，其進行期間，也就成了動物實驗正反雙方企圖影響輿論以及施壓政府之關鍵時刻，並帶來另一波運動新高峰。

棕狗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為相關運動最有力的宣傳。棕狗案例更暴露 1876 年法案規定與執行上常被詬病的幾項嚴重問題，如教學示範之動物實驗之正當性、麻醉使用、領有執照者未依規定行事、稽查人員不足等。³⁵於棕狗事件之初，並非所有動保團體都與 NAVS 採取一致立場。比如說，LAVS 一開始即擔心柯立芝所挑起的官司將消耗運動資源，且若未能勝訴，亦將影響社會大眾對於運動的觀感。³⁶但是，當生理學界以及醫學界針對棕狗事件展開動員和強烈反彈時，多數反動物實驗團體不論是漸進改革派或是完全廢止派，也都明白棕狗事件既已成為主要戰場，運動亦僅能如過河卒子般勇往向前。³⁷如反動物實驗期刊 *Verulam Review* 就表示，儘管「我方」官司敗訴，影響了運動形象，但是實驗室的許多真相也因此揭露；如今銅像已立，儘管這又是一個「選錯了的戰場」，但無論如何，「這就是當前的戰場，而我們不能再度戰敗。」³⁸類似思維讓多數團體投入了「棕狗之戰」，使之成為支配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的主要議題。

在這棕狗之戰當中，透過許多演講與會議內部發言紀錄，我們不斷見到的是高昂的戰鬥情緒，以及甚至接近脅迫、暴力式之強悍語言。很顯然，在二十世紀初，部分團體所採的短程「漸進改革」立場，並不代表抗爭力道之減弱或衝突性之降低，相反地，在語言及策略上顯然更趨激烈。

比如說，當柯立芝於 1903 年 NAVS 年會中公佈棕狗遭遇時，他充分利用了英國之國族認同，直接譴責棕狗解剖者「降低污辱了他們的種族及人性，並且帶給這所大學一個永難去除之汙點」。他並以威脅性口吻，將會場激昂之情緒帶到最高點：

³³ Coleridge, *Step by Step*.

³⁴ *Home Office Returns* (London: Printed for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03).

³⁵ 關於動物於生理學教學中的使用，參閱 E. M. Tansey, "'The Queen Has Been Dreadfully Shocked': Aspects of Teaching Experimental Physiology Using Animals in Britain, 1876-1986," *Advances in Physiology Education*, 19: 1 (June, 1998), pp. 18-33.

³⁶ "Bayliss v. Coleridge," *Animals' Guardian*, Dec. 1903, p. 144.

³⁷ "The Brown Dog," *Times*, Jan. 11, 1908, p. 6.

³⁸ "The 'Brown Dog' in Parliament," *Verulam Review*, Apr. 1908, pp. 393-395.

我相信如果大眾知道在這些罪惡淵藪中（指實驗室）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們不會等待無用的法律或是等待漫長的國會二讀、三讀程序，而是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直接將這些受害者從鐵籠中解救出來，然後把這些刑求的恐怖工具搗爛成原子顆粒，讓這國度中的每一個實驗室都化為一堆堆的廢墟。（歡呼聲）³⁹

這脅迫式的語言暴力，放到英國整體激進政治傳統中並無甚奇特，如憲章運動中著名的語言暴力策略即為著名之例。其所仰賴之意識形態，乃是揭竿起義反抗暴政之合法性。但此類暴力多半停留在言語威脅之層面，旨在傳達追求目標之決心，並以之逼迫對方就範。⁴⁰透過語言所展現之高度戰鬥性，也可見於往後一系列事件，不論是棕狗捍衛大會、區議會討論或動保團體書信。比如說，1908年當貝特希區議會一次次傳出可能移除銅像時，社會主義者卡密可（D. Carmichael）由於不滿警方保護棕狗無力，卻對醫學生過度寬宥，在一次地區棕狗捍衛大會中譴責道：「如果是一群失業者而不是醫學生攻擊了這銅像，警方早就警棍相向了。」他同時不甘示弱地威脅：「如果這些學生選擇將貝特希做為戰場，他們將受到熱烈款待。」⁴¹前市長威利斯（W. Willis）亦於會議中表示，如果醫學生準備以暴力對付銅像，「一個更大、更精緻並且刻有更尖銳碑文的銅像將會再度豎立。」⁴²至1910年，當銅像移除案真正迫在眉睫時，另一位前市長威斯特（A. West）也以同樣威脅姿態說道：「如果這些『流氓』來貝特希製造麻煩，面對戰鬥，貝特希居民也將迎戰。」⁴³他並且期望貝特希居民可以「張牙露齒」，準備「進場打一場拳擊賽」。⁴⁴其威脅姿態與高亢戰鬥力，溢於言表，但他們所欲對抗者及其實際所採行之策略，又是甚麼呢？

十九世紀中期，醫學藉由實證方法和基礎研究，開始逐漸建立起其科學地位與專業性；主導醫療科學發展的，不再是「病人床邊」的醫療實踐，而是實驗室中生理學、病理學、藥學等研究創新與發現；實驗室訓練成為專業醫師養成要件，亦是醫學建立其專業地位之晉身階。而當實驗室逐漸取得其知識論上之優越性和醫學專業上之必要性時，實驗室的大門也逐漸關閉並嚴格控管，藉以保護其從事者的群體利益，維持其專業性、獨立性和排他性。⁴⁵

面對此一變遷，對於反動物實驗者來說，實驗室這道嚴格管控之大門，不僅是個隱喻，更構成實質資訊獲取上之障礙。究竟實驗室中發生了甚麼事？動物的處境如何？各項動物實驗如何進行？達致何種成果？這些都是他們所亟欲探知並向大眾揭露的。然而，身為醫界圈外人，反動物實驗者往往不得實驗室之大門而入，而棕狗事件所涉及的第一項策略突破，就是今日已成為當代動物解放運動中往往最具新聞引爆性的特殊手段——「潛入性調查」（undercover investigation）。⁴⁶哈格比與夏道兩位女子並非為了醫學學位，而是為了取得觀察動物實驗之機會，而註冊成為醫學院之學生，待累積充分資訊後，她們即辦理休學，轉而將一切資訊提供運動做為最大之利用，並雙雙投入運動之中。⁴⁷

而這棕狗事件之濫觴，正突顯了反動物實驗運動於二十世紀初所積極貫徹的整體策略之總目標，那就是「揭

³⁹ “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 *Times*, May 4, 1903, p. 15.

⁴⁰ 參閱 J. Epstein, “The Constitutionalist Idiom,” in his *Radical Expression: Political Language, Ritual and Symbol in England, 179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28; T. M. Kemnitz, “Approaches to the Chartist Movement: Feargus O’Connor and Chartist Strategy,” *Albion*, 5 (1973), pp. 67-73.

⁴¹ “The Brown Dog,” *Times*, Jan. 11, 1908, p. 6.

⁴² “The Brown Dog,” *Times*, Jan. 23, 1908, p. 8.

⁴³ “The ‘Brown Dog’ at Battersea,” *Times*, Feb. 10, 1910, p.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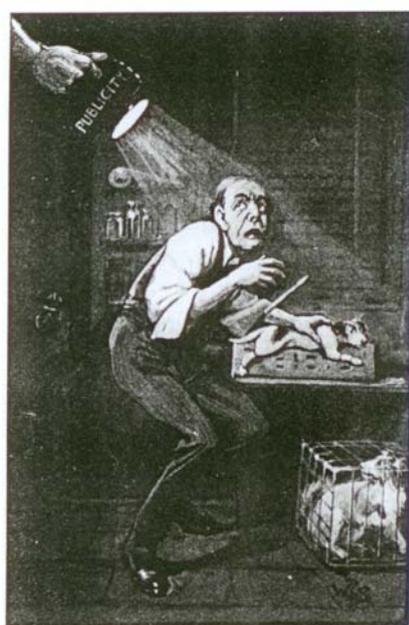
⁴⁴ “The ‘Brown Dog’ at Battersea,” *Times*, Feb. 10, 1910, p. 15.

⁴⁵ 關於十九世紀醫學與實驗室之發展，參閱 P. Williams & A. Cunningham eds.,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 E.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⁴⁶ 當代運動中經常可見運動者透過各種方式，如夜半翻牆、破門而入，或是應徵成為實驗室工作人員臥底進行調查，繼而將外界難以得知之實驗室狀況公諸於世。

⁴⁷ 這應屬英國動保史上運用此類手段之首例。在這之前，運動者多僅能由科學期刊、教科書、會議論文集，或是內政部年度實驗統計報告中，推敲動物實驗之狀況，並尋找當中可能違法之處，如運動第一代領導人柯柏（Frances Power Cobbe）之 *The Modern Rack* (1889) 以及 *The Nine Circles of the Hell of the Innocent Described from the Reports of the Presiding Spirits [i.e. the Leading Vivisectionists]* (1892) 都是透過這類間接資訊寫成。

露」與「宣傳」。反動物實驗者相信，只要動物實驗之真相能夠真實呈現在世人面前，輿論壓力必能終結動物實驗。這有如ADAVS所不斷強調的，「我們只有一項武器：輿論宣傳（publicity）」。⁴⁸宣傳之力量，如其於運動之圖像式文宣中所不斷使用之隱喻，仿如一強力探照燈，讓科學家於黑暗中之作為，瞬間無所遁形（圖一、圖二）。⁴⁹而此一在動物實驗史上並非特例的棕狗遭遇，之所以衍生出往後近十年不斷的集會披露、文宣出版、法庭問訊、媒體報導、群眾集會、皇家委員會調查、銅像設立、街頭演說、遊行抗議等各類宣傳活動，正是此一「揭露與宣傳」策略的極致發揚。⁵⁰在這一系列大多與棕狗事件相關之宣傳戰中，我們可見運動策略上充分利用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社會的兩項迅速發展之宣傳媒介—大眾媒體與視覺圖像，並且繼女子普選權運動之策略突破，跟隨其步伐，不畏衝突地踏上各類講台並走上街頭。以下我將其宣傳策略歸納為三大類型—媒體策略、美學策略與群眾策略—並逐一分析其相對於前期之創新與突破之處。



Shedding light on professional cruelty.
 "Publicity." The Light dreaded by all Vivisectors', from
 an issue of *The Anti-Vivisection Review*, 1909-10.



Still Fearing Publicity: The Secret Removal of the Brown Dog Memorial.

三、媒體策略：棕狗事件與「新新聞」(new journalism)

英國自十七世紀即有報刊之發行，但直至十九世紀中期為止，各種繁複課稅如廣告稅、紙張稅、印花稅等所謂「知識稅」，使報刊價格高居不下，其讀者群遂亦多侷限於中上階層。經過自 1830 年代以來廢除印花稅等運動的各項努力，1855 年，英國政府終於廢除了最後一便士的印花稅，開啟報業新紀元。往後數十年間，受到印刷術生產效率之提升與低廉成本、鐵路網絡之發達、大眾識字率之提高、十九世紀末大眾休閒與閱讀習慣之養成等多重因素影響，報業逐漸由政治菁英之專屬品，轉而成為一般大眾、乃至工人階層皆有能力消費之文化商品，提供其新聞、知識乃至消遣之重要來源。

十九世紀末，印刷術持續的進展，包括轉輪印刷機以及新型排字機的改良，以及新聞用紙原料之改變，都使得報業印刷必須更為仰賴大型機械，這也使其轉型成為資金密集產業，並促成合股經營與量產需求之提升，帶

⁴⁸ L. Lind-af-Hageby, "To My Friends in the Anti-Vivisection Cause," *Anti-Vivisection Review*, Apr.-Jun. 1914, p. 61.

⁴⁹ Cartoons inserted in *Anti-Vivisection Review*, 1(1909-10),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911), unpaginated.

⁵⁰ 這亦常招致反對者之批評，認為棕狗被利用為「反動物實驗的廣告」，參閱 "The Brown Do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an. 4, 1908, p. 47.

來整體產業之擴張。而這產業結構之改變，也開始讓報紙之經營策略，起了重大之轉變。

首先，許多新興報紙，比如說 1896 年所創辦之《每日郵報》(Daily Mail) 與 1903 年所創辦之《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為擴充其販售數量，開始將讀者群鎖定在廣大的中下階層及過去報業所長期忽略的女性讀者群。鎖定對象之不同，也帶來編輯方針上之轉變。有別於傳統日報如《泰晤士報》(The Times)，這些大眾化報業對於哪些事物才具有新聞與刊載價值，以及應該以何種形式呈現各類資訊，皆有了有別於以往之判斷。在主題上，它們降低了嚴肅政治新聞與論述，增加了更為通俗之運動、休閒與家庭民生等版面；在報導方式上，它們轉向更為簡短之文章、更聳動的語言以及更為醒目之版面與標題；而且，相對於過去以文本為主體之內容，轉而開始重視視覺圖像所能帶來的傳播與娛樂效果。而這編輯方針之轉變，更讓報業進入其發展上之所謂黃金期，也讓動物議題有了擴大宣傳之歷史良機。⁵¹

動保運動與報刊媒體間的密切關係，自早即已存在。對於改革者而言，報刊媒體無疑是運動的最佳宣傳媒介；對於報業而言，動保議題只要能吸引讀者興趣、反映讀者關懷，自然亦是報導對象。自 1890 年代通俗報刊紛紛成立之後，此一關係更為緊密，新興通俗報刊對於各類動物議題往往有著更大規模之接受度，例如根據「人道聯盟」(Humanitarian League) 之統計，單在 1896 一年之間，就有五百則以上全國與地方性之相關議題報導，如此高度關注，原因何在呢？⁵²

首先，相較於嚴肅的政治議題，動物議題無疑更能吸引讀者之興趣。自維多利亞後半期以來，自然史研究蔚為大眾浪潮，不同階層的人們懷抱不同目的，不論是知識探索、休閒娛樂、自我教育或道德教化等，興致盎然地投入對於大自然動植物礦物等的熱切探索。於此之際，出版業亦見商機，紛紛投入深富潛力之自然史出版市場，積極迎合並進一步刺激讀者興趣。⁵³此外，隨著動保運動之推展，英國「愛動物之國」(an animal loving country) 的形象亦日趨強化，特別是貓狗等寵物，總是能攫取大眾歡心與關心。是以對於追求最大銷售量之新媒體而言，在這大眾自然史與愛護動物之雙重文化助力下，不論是知性、感性或是娛樂性之動物新聞或新知，抑或是能夠吸引目光的動物圖像或趣味照，皆成為有助於提高銷售量之最佳編輯素材。⁵⁴

其次，女性讀者的興趣亦是影響報業編輯之關鍵。於此報業黃金時期，各通俗日報為拓展閱讀群，無不企圖開拓報業過去觸角所未及之女性讀者群。如創辦每日發行量首度達兩百萬份的《每日郵報》和《每日鏡報》的報業大亨諾克里夫爵士 (Lord Northcliffe)，對其編輯湯姆·克拉克 (Tom Clarke) 總是不斷的訓誡：「不要忘了婦女，湯姆。在所有主要新聞版面上永遠要有個『婦女的故事』」。⁵⁵1900 年創辦《每日快報》(The Daily Express) 的亞瑟·皮爾森 (Arthur Pearson) 對他的員工亦同樣耳提面命：「永遠不要忘了車夫的太太。」⁵⁶對於報業來說，女子不但是最具開發潛力的閱讀群，婦女做為女掌家計的最大消費群，更是報業所仰賴之廣告商所欲鎖定的對象，於是，迎合女性關注與品味，也就成了通俗報紙的一大考量。但是，這一切究竟又與動保議題有何相關呢？

動保運動自十九世紀初期誕生以來，在大眾心目中總是被認為是女性支持者居多之議題。1870 年代，反動物實驗運動興起後，此一印象更是歷久彌新。此一連結之建立，雖然部分來自運動批判者貶低運動之意圖，確也有其實證基礎。法蘭奇 (R. French) 對十九世紀主要反動物實驗團體領導階層分析顯示，女性約占了 40-60%。⁵⁷普羅切斯卡 (F. K. Prochaska) 統計了十九世紀末最大之反動物實驗團體「維多利亞街協會」(Victoria Street Society, VSS) 之會員人數，亦指出於 1895 年，女性就占了 66%。⁵⁸而若論及運動中最具全國知名度之領導者，亦多為女

⁵¹ 關於英國報業之發展，參閱 Alan J. Lee,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1855-1914* (London: Croom Helm, 1976); Aled Jones, *Powers of the Press: Newspapers, Power and the Public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Scholar Press, 1996).

⁵² *Annual Reports of the Humanitarian League*, 1893, p. 2; 1904, p. 6; 1905-6, p. 3; 1907, pp. 5 & 11; 1898, p. 8; 1896-97, pp. 2-3.

⁵³ 參閱李鑑慧，〈挪用自然史：英國十九世紀動物保護運動與大眾自然史文化〉，《成大歷史學報》，第 38 號，西洋史專號，頁 131-178。

⁵⁴ 這與今日英國通俗報中除腥羶色等元素外，動物新聞或圖像依然佔據熱門版面之因如出一轍。

⁵⁵ Adrian Bingham, *Gender, Modernity, and the Popular Press in Inter-War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7.

⁵⁶ 引自 Bingham, *Gender, Modernity, and the Popular Press*, p. 37.

⁵⁷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p. 239.

⁵⁸ F. K. Prochaska, *Women and Philanthrop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43.

性，包括如十九世紀領導運動逾二十年的VSS秘書長珂柏（Frances Power Cobbe），以及於二十世紀初掌握輿論焦點的ADAVS秘書長哈格比。此一現象對於仍深受男主外、女主內之「分隔領域」（separate sphere）意識型態影響的維多利亞時代來說，無疑已是相當突出，因為女性傳統上被認為屬於家庭，不應介入純屬男性之公眾事務或改革運動，除非扮演從屬或輔佐角色。⁵⁹而婦女於動保運動中的高度參與，當然亦讓亟欲開發女性族群的通俗報刊無法忽略女性特殊之關切。

此外，報刊媒體此時之通俗取向，並不代表對改革議題之揚棄，相對地，通俗媒體所代表之「新新聞」（New Journalism），往往擅長利用聳動方式報導改革議題，甚至不畏採取鮮明立場，扮演起宣傳者或改革者之角色。其中最著名者如《佩爾美爾街報》（Pall Mall Gazette），在1880年代由史戴德（W. T. Stead）接手後，對弱勢群體如工人、娼妓、雛妓等相關議題保持高度關注。例如在雛妓議題上，《佩爾美爾街報》不但發起群眾運動，甚至還協助法案推動，促成了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將女子同意性關係的年齡由13歲提升至16歲。⁶⁰此外，相對於傳統報導，此類新新聞亦以其煽動性手法與戲劇性呈現方式著稱，一方面喚起讀者之憐憫與義憤之時，一方面亦同樣滿足了讀者之偷窺慾，達成娛樂效果。而棕狗事件之種種戲劇性發展，不論是法庭騷動、學生暴動、地區抗爭，以及消失於暮色中的銅像等，正如一出曲折離奇的長篇大戲，構成通俗媒體之最佳報導題材。

動保運動與新媒體之結合，實則各取所需，而在棕狗事件中，我們更可見到運動團體在理解當代媒體屬性後所精心規劃、步步為營的一種媒體策略。

自「柯立芝vs貝里斯」案開庭之始，新聞媒體，尤其是通俗報紙，即開始以最大篇幅報導案情。各通俗報如《每日郵報》、《每日鏡報》、《每日新聞》（Daily News）等，更是每日細密地追蹤案情發展。相對於《泰晤士報》全文轉載庭上訊問這類以文本為主的傳統法庭案件報導，通俗報尚增添了庭內庭外衝突等引人注目之花邊新聞，例如醫學生的種種干擾、叫囂和抗議活動等。以圖像呈現大幅取代傳統文字報導著稱的《每日畫報》（Daily Graphic），甚且配合訊問內容，插圖描繪涉案者於庭上各種姿態。⁶¹其後，隨著棕狗事件衝突性之提升，尤其是在醫學生展開一系列抗議行動後，媒體更是緊密追蹤報導。在1907年11月第一起棕狗攻擊事件後，《每日畫報》在頭版全版放上了棕狗銅像照、醫學生法庭素描像和生活照等相片（圖三）。⁶²《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則刊登了一幅以警察和人群為背景的棕狗銅像漫畫；圖中，石檯上的棕狗已嚇得雙腿夾尾驚恐萬分，而旁邊一群手拿鐵鍬、鎚頭和鐵棒的學生，似乎正打量著該如何對之下手。⁶³（圖四）醫學生對反動物實驗或是棕狗捍衛集會鬧劇式的干擾行為，往往也是通俗媒體或以文字或圖像所企圖捕捉的。例如《每日畫報》派駐記者，素描了一場捍衛棕狗大會，當中除了描繪會議主角之發言神態，包括貝特希市長、哈格比以及著名女權爭取者戴絲帕等，還有醫學生被糾察隊四腳朝天抬出會場的衝突畫面。⁶⁴（圖五）這些圖像，無疑捕捉了棕狗事件中最具戲劇性的元素，而這種種報導與評論，對運動而言，皆有助於議題曝光及輿論討論。

⁵⁹ 「分隔領域」乃由女性主義史家所提出，認為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因受社會、經濟之快速變遷及十八世紀末興起之福音主義影響，逐漸走向富裕並掌握領導權之新興中產階級，將女性角色界定為從屬於家庭、靈性、宗教等私領域，僅適於從事孩童養育、家庭管理與道德教化、慈善事業等工作，與屬男性之公眾領域嚴格區隔。動保運動或因其宗教屬性、慈善性質並訴諸憐憫情感等因素，吸引較多女性支持。有關「分隔領域」，參閱 Catherine Hall, "The Early Formation of Victorian Domestic Ideology," in her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pp. 7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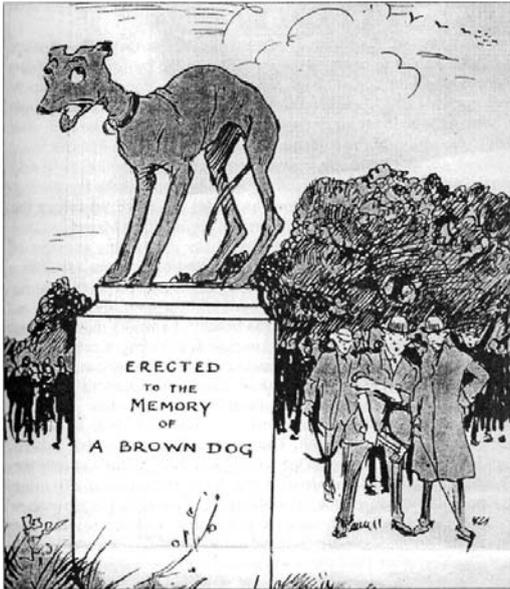
⁶⁰ 參閱 J. H. Wiener, *Papers for the Millions: The New Journalism in Britain, 1850s-1914* (New York: Greenwood, 1988); Judith R.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2), chapters 3 & 4.

⁶¹ "The Vivisection Case," *Daily Graphic*, Nov. 18, 1903, p. 5. 《每日快報》於1932年併入《每日寫真報》（*Daily Sketch*）。

⁶² "A Rag—Its Cause and Its Sequel," *Daily Graphic*, Dec. 12, 1907, p. 1.

⁶³ Mason, *The Brown Dog*, p. 45.

⁶⁴ Ford, *The Brown Dog and His Memorial*, p. 43.



A 1907 Daily Express cartoon celebrates the first attack on the dog



如同史戴德所開創之新新聞特色，部分媒體並沒有維持中立報導，而是明顯與運動站在同一陣線，《每日新聞》即是一例。除了譴責法院判決，它並且呼籲大眾支持反動物實驗運動行之有年的杯葛行動，停止捐款給從事動物實驗之醫院。⁶⁵而反動物實驗陣營儘管敗訴，亦仍充分利用友善媒體，持續法庭外的輿論拉鋸戰，如柯立芝便是透過《每日新聞》在報上發動募款，請大眾協助分攤五千鎊的敗訴賠償金，而「義憤的大眾」也在短短數日內捐款近六千鎊。⁶⁶反動物實驗團體似乎清楚，做為社運團體，他們所要爭取的，並非法庭上的勝負，而是輿論支持，而這項工作，必然得仰賴媒體，尤其是擁有龐大銷售量之通俗媒體。

四、美學策略：視覺宣傳與實景再現

視覺宣傳

除了對新媒體本質的充分掌握，反對動物實驗運動於其宣傳戰中，同樣積極運用了另一個商業概念和產物，那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另一新物質文化—大型海報。傳單與海報向來是英國政治文化中長久存在的元素之一，但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如同上述新媒體一般，隨著迅速發展的印刷科技與大眾消費文明之進展，此一傳播媒介開始起了質與量的變化。首先，平板印刷術的改良，讓海報擺脫過去限制，得以更大的尺寸及更齊全的色彩，大量且廉價地印刷。這樣的科技，很快被運用在商業廣告上，帶來深具現代特色的廣告文明，而此時主要政黨及社會運動亦迅速隨其之後，運用此一視覺文化，進行政治論述與宣傳。只要大選時間將至，如同倫敦西區劇院廣告般巨幅的政黨看板，便紛紛占據城市最搶眼之空間；各種群眾運動例如女子爭取普選權運動，亦同樣利用大型看板，如同音樂劇廣告般，宣傳運動之大型集會與活動。⁶⁷

針對此一政治與廣告結合之現象，重要政治評論者葛拉翰·華勒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於二十世紀初即提出了觀察與批判。他指出，英國政黨已然開始運用廣告學中品牌建立之概念，不再訴諸具體論述與理性分析，而是利用圖像式宣傳如大型看板，訴諸大眾情感與習慣以獲取支持。⁶⁸華勒斯的論述開創了政治學研究中

⁶⁵ Mason, *The Brown Dog*, pp. 18-19.

⁶⁶ Stephen Coleridge, "VIII—The Brown Dog," *Zoophilist and Animals' Defender*, May 1910, pp. 6-7.

⁶⁷ 關於女子普選權爭取運動，參閱 Sandra Stanley Holton, *Feminism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and Reform Politics in Britain 1900-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tin Pugh, *The March of Women: A Revisionist Analysis of the Campaign for Women's Suffrage 1866-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old L. Smith, *The British Women's Suffrage Campaign, 1866-1928* (Harlow: Pearson, 2007, 2nd ed.).

⁶⁸ 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3rd ed., 192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8), pp. 59-113.

的心理學派，提醒人們各種政治現象並非如過去之認知，乃是由純粹理性因素所支配，而是深受各種非理性之心理因素所左右。暫且不論此一現象對政治論述品質之影響，此一美學策略確實是此世紀之交、大眾文化興起、商業廣告發展下的一個潮流，而這視覺文化與政治文化之間的結合，近來也逐漸受到史家之重視，糾正了傳統政治史研究中過度偏重論述性文本及過度強調政治理性之取向。⁶⁹

同樣地，二十世紀初之反動物實驗運動並未自外於此一潮流。反動物實驗團體經常租用公車與馬車車身或是火車站附近之大型廣告空間，宣傳活動與理念。透過此時期以捍衛動物實驗為目標的最主要團體RDS所留下之資料，我們知道，比如說，1909年3月，倫敦區鐵路（District Railway）懸掛了70幅大型反動物實驗海報；大西部鐵路（Great Western Railway）車站也張貼了50張海報。顯然，RDS對此宣傳策略十分在意，並積極尋求反制。它最早的做法乃是向鐵路局抗議廣告內容不實，要求下架，此舉偶爾可獲致成功，如1910年便成功阻擋了BUAV向倫敦公車公司（London General Omnibus Company）所承租之一百個車身廣告。⁷⁰但是在歷經數度失敗後，RDS也就改弦易轍，雖不再主動張貼海報，但若遇到反對陣營豎立大型廣告，RDS便也立即跟進，並將其海報盡量「緊臨其旁」，以發揮最大平衡宣傳之效。⁷¹

對於這些廣告內容為何，可惜我們所知不多，但由RDS之強烈反應，我們似可推定其頗具宣傳或威脅之效。就美學宣傳與傳統著重文字論述之宣傳相比，我們亦可推論出幾項特點。首先，廣告強調訊息之快速傳遞，在快速繁忙的道路與車站上，以最直接之方式與大群過路客建立意義連結。其次，廣告多著重圖像，若有文字則多求簡潔或僅為圖像之輔助，它所訴諸的，多為情感與情緒反應，而非理性認知。如華勒斯所舉之例，當代茶商在廣告中已不再如傳統上將茶葉之資訊詳實呈現，而可能會選擇各種象徵符號，訴諸情緒與潛意識，如將茶葉與對老祖母之回憶、英國艦隊或是動人女子形象連結，藉此創造出非關產品性質或品質、但卻有利行銷之價值與情緒連結。⁷²此一廣告特色，常讓評論者憂心將使政治論述和輿論在理性深度上嚴重衰退，尤其在選民階層不斷向下層擴張的大眾年代。如哈布豪斯（L. T. Hobhouse）就嘲諷所謂輿論所代表的不過是「街上之人」（the man-in-the-street）或是「公車乘客」（man-on-the-top-of-a-bus）之意見，而這些人不斷搖擺轉移的意見可能僅是來自他所「聽到的三個矛盾的報導和街上看到的兩張說謊的海報」。⁷³華勒斯也批評倫敦的大幅廣告牌所訴諸的多是閱讀者非理性的連結、潛意識的推論，而非批判性的邏輯思維，並對選舉中之大幅利用不以為然，譏為「戲法」（conjuring trade）。

74

RDS的活躍成員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於RDS1909年會中，就提到他在許多車站看到一張很「煽情」（melodramatic）的海報，在這張海報中，一隻小狗跪在一個「滿手血腥的動物實驗者」（bloody-minded vivisector）面前，請求饒恕。這張海報今日雖已難尋，但這圖像似乎立即可以使人聯想到十八世紀末英國反奴隸運動中廣為流傳的一個身繫鐵鍊之奴隸單膝下跪、雙手做出祈求動作之黑奴圖像（圖五）。⁷⁵道爾頗為義憤地說，他當下的反應並非想撕下這海報，而是加以延伸發展，再請另一位藝術家在旁邊畫出一個抱著身負重病孩童的母親，然後再加上標題「你要救哪一位？」。⁷⁶這位創造出膾炙人口之福爾摩斯角色的小說家，顯然充分掌握了美學訴求的

⁶⁹ 近年重要代表作，參閱 Lisa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Nicholas Mansfield, "Radical Banners as Sites of Memory: The National Banner Survey," in Paul A. Pickering and Alex Tyrrell, *et al.*, *Contested Sites: Commemoration, Memorials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ldershot: Ashgate, 2004), pp. 81-100; James Thompson, "'Pictorial Lies'—Posters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c. 1880-1914," *Past and Present*, No. 197, Nov. 2007, pp. 177-197.

⁷⁰ Mar. 17, 1910; Apr. 13, 1909; Jun. 14, 1909; Nov. 14, 1910; Dec. 19, 1910, Minute Book,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1908-1919, Wellcome Medical Library, SA/RDS/C1.

⁷¹ Feb. 22, 1909, Minute Book,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⁷²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pp. 88-89.

⁷³ L. T. Hobhouse, *Democracy and Reacti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pp. 70-71. 對群眾理性之批判，另參閱時代經典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T. F. Unwin, 1896).

⁷⁴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pp. 98-113, 105.

⁷⁵ 此一圖像首先於 1878 由維哲伍德（Wedgwood）家族之陶瓷公司設計為項鍊吊飾，後廣為運動以不同媒介複製，並成為「英國反奴隸協會」之標誌，<http://www.darwinproject.ac.uk/top-10-letters-human>, 2011.05.15 點閱。

⁷⁶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ul. 3, 1909, pp. 23-25, at p. 23.

必要元素：引人注目、訴諸情感、單一意義連結與戲劇張力。我們雖無資料證實這個將人與動物對立、並製造出二選一之簡化命題的「要孩子還是要狗/動物」之想法是否曾被RDS付諸實行，但此一有力宣傳意念，確實於往後二十世紀下半期之動物實驗爭議中，普遍為支持動物實驗社團所運用（圖六）。⁷⁷



此外，當運動於十九世紀末開始有意識地拓展下階層之支持時，VSS的巡迴演說員亦往往於其公開演說中結合動物實驗之圖片展示，藉由圖像衝擊所能引發之情緒反應以達至成功說服效果。如VSS於工作報告中就提到，1897年當「反動物實驗選舉聯盟」(Electoral Anti-Vivisection League)的巡迴演說員在北威爾斯礦區各地替反動物實驗候選人輔選，舉辦戶外集會演說時，只要當講者展示出動物實驗實景圖像的那一剎那，總會引起礦工們最大的譁然和騷動，並且立刻可以讓礦工們開始「口無遮攔」，這些地區也就很快成為了反動物實驗運動的新據點。⁷⁸

此類視覺宣傳策略經常受到反動物實驗陣營之美學宣傳之批判，指其簡化複雜之科學程序與知識、無能提出細緻論述、訴諸科學門外漢之情緒反應而非理性思考能力等等。實際上，此一宣傳手法於更早之時，也面臨來自運動內部之反對。部分組織因顧及運動形象，擔憂這樣一些逼真聳動圖像將會對儒雅文化與士紳品味構成冒犯而有所顧忌。比如說，深具名望、擁有眾多貴族、議員乃至皇室贊助者之VSS，其秘書長珂柏儘管於其著作如《伯納德的殉道者》和《當代刑具》中使用了許多由科學期刊或教科書複製而出的動物實驗之細部或放大圖示，⁷⁹但是當她進一步欲於大眾場合公開展示這些圖片時，就遭到VSS會長謝茲柏利伯爵(Lord Shaftesbury)的強力反對。謝茲柏利不但反對珂柏使用張貼了動物實驗圖片的「三明治人」之提議，兩人對於VSS所計畫舉辦之幻燈片教育展究竟應該展示哪類圖片也持有異見；兩人雖然同樣贊同使用美麗可愛的動物幻燈片以激發人們對動物的喜愛與溫柔情感，但是，對於謝茲柏利所形容的「充滿恐怖和易引人反感的」寫實動物實驗圖像卻無法達成共識。⁸⁰就如同更早之時，運動一忠實國會代言人格林伍德(George Greenwood)亦同樣不滿見到車站外所張貼之印有動物實驗實況之海報。⁸¹這些內部反對聲音皆顯示出更早一代之運動者較為含蓄保守之美學策略，強調宣傳應訴諸大眾理性並應適度合宜，尤其不應冒犯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之美感尺度。只是這一切擔憂聲音，隨著十九世紀末整體政治氛圍乃至運動策略之激進化，已漸趨微弱，反動物實驗運動已然展開對時代環境與運動文化之有效回應，積極運用各種具有情緒渲染與煽動力量之美學策略。

店鋪實景

二十世紀初，動物實驗運動於策略上另一個與商業、美學宣傳概念充分結合的突破，乃是宣傳店面的設立。

⁷⁷ 參考<http://abcnews.go.com/Health/Drugs/animal-research-billboards-pit-cute-girl-lab-rat/story?id=13371007>，2011.05.15 點閱。

⁷⁸ "The Electoral League at the Bye-Elections," *Zoophilist*, Nov. 1897, p. 121.

⁷⁹ Cobbe, *The Modern Rack*; F. P. Cobbe ed., *Bernard's Martyrs* (London: Victoria Street Society, 1880).

⁸⁰ 引自 Lori Williamson, *Power and Protest: Frances Power Cobbe and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River Oram Press, 2005), pp. 147-149. 最後究竟這場教育活動中是否有放映這些較具視覺衝擊力之圖片，並無確實資料可顯示。

⁸¹ George Greenwood, "Vivisection," *MacMillan's Magazine*, 40 (1879), pp. 523-530, at p. 530.

念。

五、群眾策略：女子演說與街頭遊行

女子演說

英國動保運動於十九世紀初興起，直至十九世紀末，基本上乃由中上階層所主導。這階級屬性，事實上也決定了運動所採行策略。在手段策略上，它延續著自十八世紀反奴隸運動以來所建立起之行動傳統，包括連署、陳情、集會演說、讀者投書、刊物出版、文宣散發等這些不具脅迫暴力性質之手段。運動所訴求的對象，基本上是具有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之中上受教階層，至於更廣大的下層群眾，除了做為被訓誡、教化與改革之對象，並非運動早期所積極開拓之支持者族群。然而，這一切至十九世紀末，隨著政治環境之變化，開始有了轉變。

首先，對於動保運動衝擊最大者，莫過於十九世紀間民主基礎之擴大。在改革人士的持續推動下，英國於 1832 年、1867 年以及 1884 年，陸續通過了三主要國會改革法案，逐步往下層賦予英國成年男子投票權。至 1884 年，約六成男性已獲選舉權，而 1918 年的「人民代表法」則更進一步賦予了所有成年男子以及 30 歲以上之女子投票權。⁸⁹面對此一選民基礎之擴大，各主要政黨及媒體，無不積極爭取新興政治階層之選票。多年嘗試推動廢止動物實驗法案不成的動保運動，亦開始意識到在這民主化的年代，下階層支持之重要性，故自 1880 年代，各主要團體皆開始主動走向群眾，有意識地拓展與組織下階層支持者。⁹⁰VSS 自 1880 年代起，便即仿激進政治運動行之有年的做法，聘用專職之巡迴演說者，至英國各地進行演說。⁹¹各團體也紛紛針對工人社群宣傳，並成立附屬工人團體，例如「國際廢止動物實驗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Total Suppression of Vivisection; IATSV) 於 1881 年成立了「聖瑪莉工人反動物實驗協會」(St. Mary's Working People's Anti-Vivisection Society)，隨後 VSS 成立了「倫敦東區分會」，LAVS 也成立了「布萊頓工人分會」(Brighton Working Men's Branch)⁹²。而這些獨立的工人分會，自然亦標示著運動內部依然存在的階級區隔。此外，每至選舉或補選期間，這類爭取下層支持之工作更是特別積極，各運動團體除了利用選舉宣傳期公開質問候選人對於動物實驗之態度，同時也積極鼓吹選民將選票投給支持廢止法案之候選人。這工作原本由各團體各自為之，1895 年時，各主要團體更進一步統籌成立了「反動物實驗選舉聯盟」(Electoral Anti-Vivisection League)，全力推動輔選相關事務。⁹³

當運動走向更廣大群眾之時，它也務必做出相對應之策略修正，開拓新的傳播管道與運動形式，而其中最主要者莫過於戶外集會與街頭遊行。戶外集會於英國政治傳統當中，向來與下層激進政治緊密連結。在政治改革浪潮高張的十九世紀上半期，動輒上萬人的集會動員能力，如憲章運動的無數大型戶外集會，尤其具有政治威脅性和體制顛覆力量。但也因其激進形象，戶外集會與遊行並非一般著重體面形象之中產階級運動所會採用之策略。在英國國會尚不具普遍代表性之時，來自中上階層之政治人物一般並不積極尋求與群眾接觸之機會，而其最直接與群眾碰撞機會，不外就是英國政治文化當中特殊的選舉提名日。在這個日子，政治人物必須儀式性地於提名集會中和選區群眾——亦包含無投票資格者——展開面對面之溝通並接受質問。於此戶外集會中，候選人往往必須面對來自地區群眾的言語挑釁、公開嘲弄、推擠拉扯乃至肢體暴力等，也因此，此一場面多被政治人物視為畏途，或是參選不得已之代價。然而，當 1867、1884 國會改革法案逐一通過後，各主要政黨不得不將宣傳觸角伸展至下層社區，政治人物也不得不走出具有高度階級屬性之室內空間，走向屬於下層群眾之戶外集會空間。幸而另一

⁸⁹ 參閱 Robert Pearce and Roger Stearn, *Government and Reform: Britain 1815-1918* (London: Hodder Murray, 1994), pp. 54-81.

⁹⁰ 參閱 *Animals' Guardian*, May 1897, p. 123; *Anti-Vivisectionist*, Sept. & Oct. 1881, p. 109; *Zoophilist*, Sept. 1881, p. 77; *Zoophilist*, Mar. 1, 1893, p. 304.

⁹¹ "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Victorian Street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Zoophilist*, Jun. 1, 1896, p. 25; "Protest from Pimlico," *Zoophilist*, Dec. 2, 1895, pp. 267-8.

⁹² *Animals' Guardian*, May 1897, p. 123; *Anti-Vivisectionist*, Sept. & Oct. 1881, p. 109; *Zoophilist*, Sept. 1881, p. 77. 隸屬 VSS 的 Bristol and Clifton Anti-Vivisection 於 1893 亦成立了 Bedminster Working-Man's Branch, 參閱 *Zoophilist*, Mar. 1, 1893, p. 304.

⁹³ "On First Report of the Electoral Anti-Vivisection League," *Animals' Guardian*, Aug. 1896, p. 188.

方面，隨著十九世紀五、六零年代，英國進入經濟相對富裕、政治相對穩定之維多利亞繁榮時期，人民對於政府信任相對提升，在選舉權逐步向下開放之後，下層激進政治之威脅性更是普遍降低，戶外集會之體制顛覆性亦不若以往。再加上 1872 年之〈秘密投票法〉(the Ballot Act) 以及 1883 之〈舞弊與非法選舉行為防治法〉(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之通過，亦讓選舉期間戶外集會所經常伴隨的暴力、威脅、賄賂舞弊、飲酒狂歡、集體暴動等情事大大減低。於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戶外集會也就成為各方勢力所欲積極開發之政治角力主要場域。不論是主要政黨或是社會運動團體，只要是有意爭取下層乃至一般大眾支持者，都開始走向戶外、走向街頭，或是專屬工人之公共空間如工廠、勞工俱樂部、激進俱樂部 (Radical Clubs)、「機械工學院」(Mechanics' Institutes) 等，⁹⁴而此時的反動物實驗運動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對於一個女性支持者、甚至女性領導者佔多數之運動，此一策略上之突破仍需仰賴此時期另一政治文化之突破，那就是女性進入政治領域並打入傳統中專屬男性之講台和街頭。

女性雖然從未於激進政治運動中缺席，但其所扮演角色，經常僅為輔助性質。於各類集會中，女子向來擔任的主要是後勤任務如布置講台、準備布條標語或是陪伴先生出席等。女子一旦站上講台，往往引起側目並被視為逾越了性別上之行為規範，如女子普選權運動先驅梅莉珊·佛賽特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提到她在 1860 年代末期第一次與另一位國會議員夫人踏上講台宣揚理念時，兩人就被評論者嘲諷取笑為「自取其辱」。⁹⁵雖然至十九世紀末期，女子演說之比例略有提升，但史家羅倫斯 (Jon Lawrence) 指出，競選集會中女性講者之比例實際約僅佔 8%。⁹⁶此一男性為主之政治演說文化，也經常讓逾越性別界限之講台經驗帶給女性改革者強烈衝擊，並留下難以抹滅之印象，⁹⁷這也使得學者史考特 (Joan W. Scott) 提出，除了母親角色外，公開演講經驗乃是建構此時女性主義者想像與認同的主要來源之一。⁹⁸

除了突破演講台所劃分之傳統性別疆界，二十世紀初，部分女子普選權爭取者亦更進一步援用了男性政治集會中的「干擾政治」(politics of interruption) 傳統。女子普選爭取運動自 1860 年代展開以來，至二十世紀初已逾四十載卻仍未取得任何實質立法進展。失望挫折之餘，再加上自由黨於 1906 年大選之後違背先前承諾未予助力，部分運動者於是轉而採用較為激烈之手段，帶起新一波轟轟烈烈的女子普選權運動。⁹⁹「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WSPU) 以及由戴絲帕所領導的「婦女自由聯盟」(Women's Freedom League; WFL)，乃是此波激進運動之主要主導團體，其採用手段包括攔截質問政治人物、縱火、砸窗、破壞公物、抗稅、獄中絕食等方式藉以爭取大眾關注，而其中最為慣用者即為集會干擾行動。這些女性改革者，效仿著男性政治異議者於選舉提名日或公眾集會中之所為，於政黨集會乃至國會殿堂中刻意製造混亂場面以干擾會議之順利進行，藉以表達不滿並引起輿論關注。比如說，WFL 於 1908 年即選定了初任自由黨財政部長的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於倫敦亞伯廳 (Albert Hall) 的一場大型演講進行強烈干擾，在此次行動中，約七、八十名女權爭取者於演講大廳中使盡了各種干擾手法，包括穿著囚衣靜默抗議、叫囂、尖叫、隔空喊話、就地自行演說、高唱「他是個大好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與糾察隊扭打、揮打狗鞭等等。最後，儘管主辦單位出動了大約三百名糾察隊員，仍無法控制場面，而喬治原應只有二十分鐘的演說，也拖至兩小時才得以結束。¹⁰⁰這個著名的亞伯廳事件以及國內各地此起彼落的會議干擾行動，讓國會於 1908 年年底通過「公眾集會法」(Public Meeting Act)，企圖

⁹⁴ 關於戶外集會演說於英國政治中所扮演角色之轉變，參閱 Jon Lawrence, *Electing Our Masters: The Hustings in British Politics from Hogarth to Bla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⁹⁵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What I Remember*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5), p. 88.

⁹⁶ 引自 Lawrence, *Electing Our Masters*, p. 86.

⁹⁷ 參閱 Fawcett, *What I Remember*, pp. 87-88.

⁹⁸ Joan W. Scott, "Fantasy Echo: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 pp. 284-304.

⁹⁹ 關於激進派之女子普選權爭取運動，參閱 Laura E. Nym Mayhall, *The Militant Suffrage Movement: Citizenship and Resistance in Britain, 1860-19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tin Pugh, *The Pankhursts: the History of One Radical Family* (London: Vintage, 2008).

¹⁰⁰ "Mr. Lloyd-George and Woman Suffrage. Disorderly Scenes," *Times*, Dec. 7, 1908, p. 6.

以司法約束懲戒此類干擾行為。¹⁰¹羅倫斯曾指出，史家往往未將女子普選權爭取者的議會干擾策略置於傳統政治集會文化中看待，以致認為這些女性破壞了英國政治的「和平」傳統，實際上這些女性並非破壞，而僅是要求進入這過去僅容許男性參與的政治集會文化。這類干擾行為，長久以來也幾乎被容忍默許為英國政治集會文化之一部分，被認為是一種不同意見公開角力之方式，從不至於立法加以限制。¹⁰²但是，當女子普選權爭取者選擇運用這類專屬男性之集會干擾策略時，她們卻面臨了更為強烈之反彈，經常被男性糾察隊乃至警察揪舉出場或暴力相向，或是於其集會當中受到來自男性更為激烈的報復和挑釁。¹⁰³

置於此一政治集會文化傳統中理解，我們可以明白，當反動物實驗運動中之眾多女性踏上講台或是街頭肥皂箱時，其所挑戰的，正是以男性為主體的政治集會文化。而儘管這些反動物實驗者並未主動干擾他人集會，卻往往成為醫學生施用干擾策略之對象。

1907年12月，當棕狗暴動正高昂、醫學生接連被逮捕之際，義憤的醫學生即運用此一干擾傳統，阻撓多場反動物實驗集會之進行以示抗議。12月11日，根據《每日新聞》的報導，兩百名醫學生參加了一場由「伊林與艾克頓反動物實驗協會」(Ealing and Acton Anti-Vivisection Society)所舉辦的室內集會。會中學生不斷叫囂、揮帽、揮棍、吹喇叭、放鞭炮並且施放刺鼻煙霧，在一片噪音、混亂與濃煙中，許多聽眾只得以手帕掩鼻，紛紛離場。台上講者，包括哈格比在內，皆無法順利發言。為制止學生行為，會議糾察隊與學生展開扭打，最後在場許多男性聽眾亦加入戰局，足足打了十五分鐘群架，桌椅盡皆砸壞，警方最後才介入並逮捕了一名學生。¹⁰⁴

學生並不就此善罷甘休，隔了數日，他們再度前往干擾倫敦卡克斯頓廳(Caxton Hall)的一場演說。這場演說乃是由哈格比主講，講題是「醫學生與動物實驗」，顯然哈格比並不因集會暴力而怯步，只是主辦者事前做了些防範，採取索票制，且票上註明「醫學生不得入場」。然而，許多學生還是以各種方式混入場內。當哈格比演講時，這些學生不斷叫囂著「撤回妳的指控」、「這不是真的」。之後當其她女士登台演說時，學生同樣再度製造一片混亂，會議只好匆匆宣告結束，一群學生於是衝上講台，高唱「小棕狗」，還有「他是個大好人」這首派對賀歌，只是歌詞中的「他」皆被改為女性的「她」。唱得盡興後，醫學生再度遊行至倫敦市中心。¹⁰⁵

類似的會議干擾，成為棕狗事件中常見的插曲，甚且延展至整體反動物實驗運動中。¹⁰⁶與棕狗事件較無直接關聯之BUAV，記載當其蘇格蘭隸屬團體之店舖於1912年開張後，也曾受到愛丁堡大學醫學生之抗議砸店，最後引發暴動並導致26名學生被捕。¹⁰⁷或許對於醫學生而言，成員有部分重疊的反動物實驗運動與女權運動僅管議題殊異，但兩者對於專屬男性之集會抗議傳統之挑戰，都同樣是這時代之新文化現象，基本上受爭議的，亦是抗議與挑戰之對象。故不論是醫學生對於反動物實驗會議之干擾，或是ADAVS等團體的正面迎戰，其實都應置於這類傳統上屬於男性之政治集會文化中看待。環繞棕狗事件的一系列充滿衝突挑釁、玩鬧嘲諷的集會場面，不單來自棕狗或是動物實驗議題本身之爭議性，更來自此時運動中，尤其是女性，走出文雅大廳、走上講台之際，所挑戰的傳統政治文化，而這性別與階級界限之逾越，自然也更進一步加強了運動於策略上之激進屬性。

街頭遊行

如同女子演說，反動物實驗遊行在今日看來或許絲毫不足為奇，但若置於動保運動策略之長期發展脈絡中，卻代表著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運動策略的另一項重大突破。如同政治集會及其干擾傳統，街頭遊行同樣與男性

¹⁰¹ 但基於對此一政治抗議傳統之尊重，以及為了避免冒犯選民，各政黨直至一次戰前皆無援用此法。1910年大選集會之混亂，反而較先前更甚，參閱Jon Lawr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Public Politic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Past and Present*, No. 190, Feb. 2006, pp. 185-216, at pp. 191-192.

¹⁰² Jon Lawrence, "Contesting the Male Polity: The Suffragett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ruption in Edwardian Britain," in Amanda Vickery ed., *Women, Privilege and Power: British Politics, 1750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0-226.

¹⁰³ Lawrence, "Contesting the Male Polity."

¹⁰⁴ Ford, *The Brown Dog and His Memorial*, pp. 14-17.

¹⁰⁵ "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tudents," *The Times*, Dec. 17, 1907, p. 9.

¹⁰⁶ *Debate between Miss Lind-of-Hageby and Mr. B. J. Collingwood* (London: NAVS, 1906), pp. 20-21, 28.

¹⁰⁷ Hopley, *Campaign against Cruelty*, p. 15.

激進政治傳統有著密切連結，並非十九世紀中產體面之主流動保運動所慣用。但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當動保運動於意識型態上逐漸激進化，成員也逐漸向政治激進圈與下層階級擴展後，示威遊行之宣傳方式亦逐漸被採用，儘管其援用次數，依然屈指可數。

就目前可得資料，動保史上最早之遊行應是 1894 年由倫敦「皮令可激進俱樂部」(Pimlico Radical Club) 所主辦的一場反對「英國預防醫學機構」(British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IMP) 於倫敦雀喜區興建的抗議遊行。此場遊行參與者多來自工人階層與政治激進勢力，包括「雀喜勞工聯盟」(Chelsea Labour League)、「砌磚工協會」(Operative Bricklayer's Society) 等團體以及附近民眾。根據BIMP所雇用之私家偵探的記錄，參與者大多「骯髒不體面」，並且還提到其中一工人階層出身的女權爭取者暨反動物實驗運動之專職演說者潔西·克萊根 (Jessie Craigen) 如何地不修邊幅，並且「邊走邊吸著一顆橘子」，顯然有意暗示此一活動參與者多為下層粗鄙之人。¹⁰⁸針對同一議題，隔年 1895 年 11 月，另一場更大型、為數約三千人之集會遊行，也再度於當地舉行。¹⁰⁹這場遊行，儘管VSS派有代表參加，但卻非由任何大型反動物實驗團體所發起。

而真正具有代表性、由全國性反動物實驗團體發起之遊行，是兩年後的兩場大型聯合遊行。1909 年，倫敦分別舉辦了擁有上百團體共襄盛舉的兩場國際反動物實驗會議。兩場主辦者分別為代表「完全廢止」與「管制」立場的 BUAV 以及 ADAVS。在雙方各自長達五、六天的會議議程中，兩項會議皆於週六安排了一場街頭遊行，頗有互別苗頭之意味。這應可算是反動物實驗運動頭一遭將動物實驗議題帶上街頭，而一切遊行所該具備之元素也一應俱全。

BUAV所主辦的第四屆「世界保護動物與反動物實驗聯盟」國際會議遊行，在一個萬里無雲的好日子，由海德公園出發走至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據其自稱，國內外代表共準備了上百條布幔，出動了七個奏著戰歌的軍樂隊，而且，除了各團體之步行隊伍之外，還有汽車、馬車所構成之車隊。當隊伍走至特拉法加廣場時，已吸引了超過兩萬名支持者與圍觀者。¹¹⁰由ADAVS所主導的「國際反動物實驗暨動物保護會議」遊行也於出發前在《泰晤士報》上宣傳遊行陣容將如何浩大，表示將出動馬車、汽車及腳踏車隊，並且還會有不同團體所準備的兩百張大幅布條。¹¹¹

如此的遊行似乎不足為奇，但若將之置於女子激進運動之行動傳統中，才更可充分彰顯其社會意涵與開創性意義。才在不久的兩年前，女子普選權運動終於做出另一重大突破，首度走上街頭。於此之前，如同反動物實驗運動，由於礙於中產階級體面形象及性別規範，此一女性主導之運動從未採取這下層激進運動中所慣用的街頭策略。但是，主要政黨對於女子投票權承諾的一再背信，讓運動自 1906 年起，便開始頻頻借用男性激進政治中較為激烈之手段，帶起另一波抗爭高潮。

或許也是預料中事，1907 年 2 月這場婦女遊行吸引了大眾充滿好奇之目光，其參與人數雖然僅約三千人，但其一路上卻吸引了遠遠超過其參與人數的圍觀者。這女子上街頭的奇景，也即刻成為媒體評論焦點。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拋頭露面以及公開被男性與大眾凝視之經驗，絕非輕鬆愉快的。當代運動者瑞·史崔奇 (Ray Strachey) 表示，大部分參與婦女乃是抱持著有如殉道者之心情，因為她們不但冒著喪失工作與名譽之危險，還得承受大眾公開的羞辱與嘲諷。¹¹²在整場遊行當中，顯露在婦女臉上的，並非歡欣愉悅，而是如烈士般的凝重與肅穆。這一天，倫敦氣候依然寒冷不佳，這些女士們拖著維多利亞式長裙，人人裙襬都沾滿了泥濘和融雪，這場遊行也因此

¹⁰⁸ "Report of Parade and Mass Meeting at Pimlico," dated Apr. 1894, Wellcome Library Archives, SA/LIS/E.5. 關於此場遊行與醫界之應對策略，參閱 Willis, "Unmasking Immorality." 關於克萊根之女權運動經歷，參閱 Sandra Stanley Holton, *Suffrage Days: Stories from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6), chap. 3.

¹⁰⁹ "Protest from Pimlico," *Zoophilist*, Dec. 2, 1895, p. 267.

¹¹⁰ *Fourth Tr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World League* (London: J. Tamblin, 1910), pp. 335-341.

¹¹¹ "This Week Animal Congress," *Times*, Jul. 8, 1909, p. 1; "Anti-Vivisection Congress," *Times*, Jul. 3, 1909, p. 18.

¹¹² Ray Strachey, *The Caus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man's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Virago Press, 197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8), p. 306.

而被稱為「泥巴遊行」(mud march)。在跨出這第一大步之後，一回生二回熟，往後女子普選運動幾乎年年上街頭，並且一次較一次更為盛大。這些婦女團體也擅用藝術創作和劇場概念，透過鮮豔壯觀之刺繡布條及色彩一致之服飾，讓觀者留下深刻鮮明之印象，或是讓百業女子以五花八門之制服上陣，以突顯女子之專業及其對社會之廣泛貢獻，挑戰傳統分隔領域之意識形態。¹¹³

而如果「泥巴遊行」可視為女子普選權運動一關鍵策略突破，那麼，1909年反動物實驗運動的這兩場遊行則同樣也堪稱英國動保運動史上之重大進展。在BUAV的這場遊行中，參與者絕大多數依舊為男性，但是由ADAVS所主辦、提早兩週之遊行，則女性多於男性。¹¹⁴然而，因為ADAVS之激進性格及其與棕狗事件之密切關聯，在遊行尚未出發前，運動內部即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氣氛。眾所擔心的是，醫學生會不會如同干擾集會一般，破壞這場遊行。哈格比提到許多人甚至擔心醫學生會再度製造暴動，甚至會有「血腥和屠殺」狀況發生。¹¹⁵另一方面，在遊行前，反對陣營也於《泰晤士報》抗議這兩場遊行，指出在棕狗爭議尚未平息之狀況下，這些遊行無異是對醫學生之挑釁。RDS秘書長培杰也特別針對ADAVS所製作之印有動物實驗圖像之大幅宣傳布條提出抗議，並且暗示ADAVS將同樣派遣貝特希壯丁於遊行中製造暴力衝突。¹¹⁶所幸，這兩場遊行雖然於舉辦前即廣受爭議，但最後並無引爆任何直接衝突，ADAVS在警方要求下，撤回了兩張大幅轉印自科學期刊和實驗器材目錄的動物解剖圖像。¹¹⁷醫學生並無出面干擾，RDS也僅在兩場遊行中僱用了一些三明治人，走在遊行隊伍前方散發反制文宣，但無製造更大衝突。

如同「泥巴遊行」，在這之後，運動已踏出關鍵第一步，證明女子上街遊行並非如先前所想像之困難與危險。1910年，當棕狗遭「午夜綁架」之消息一傳出，貝特希地區隔日就舉辦了一場戶外抗議集會，ADAVS也在短短數日內展開動員，並於當週週末在倫敦市區舉辦另一場浩大的抗議遊行與戶外集會。這場遊行由自由黨國會議員柯克威志(George Kekewich)爵士所領隊，在軍樂伴奏下，一行人約兩三千人，浩浩蕩蕩地走著傳統政治示威遊行之慣用路線，由海德公園，經過倫敦商業和政治中心，最後走至特拉法加廣場，並於此展開戶外群眾大會(圖七)。¹¹⁸較一般政治集會遊行還更為特殊的是，此次遊行參與者不僅來自社會各階層，許多動物也一同走上了街頭。許多女士牽著或是抱著各色各樣的狗兒，也有兩位小朋友騎著兩隻小驢一路跟著遊行隊伍。另外，吸引眾多媒體報導的還包括一隻由人所裝扮的棕色大狗，坐在一輛敞篷車當中，手中抱著另一隻白色小狗，車後標語質疑著「我們為甚麼該被實驗？」(圖八)。¹¹⁹加上漫天飄揚的繽紛旗幟，構成十分熱鬧的場面，旗幟上除了寫著各參與團體的名稱、抗議字句和名人名言，其中還有著一幅失蹤的棕狗銅像，上面並寫著「為動物爭正義、爭憐憫」。(圖八)¹²⁰遊行當中由於女子人數眾多，《佩爾美爾街報》甚至評論，若未加注意，這場遊行甚至會讓人誤以為是一場女子爭取普選權之遊行。¹²¹

¹¹³ 參閱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chap. 3.

¹¹⁴ *Fourth Tr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World League*, p. 336.

¹¹⁵ "The Brown Dog Procession,"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p. 284.

¹¹⁶ Stephen Paget, "The Anti-Vivisection Procession," *Times*, Jul. 6, 1909, p. 12; Stephen Paget, "Anti-Vivisection Procession," *Times*, Jul. 9, 1909, p. 4.

¹¹⁷ "The Anti-Vivisection Procession," *Times*, Jul. 8, 1909, p. 3.

¹¹⁸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unpagged. Originally appeared in *Daily Graphic and Daily Sketch*.

¹¹⁹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unpagged.

¹²⁰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unpagged.

¹²¹ 《佩爾美爾街報》報導，參閱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p. 289. 另可參閱 "The 'Brown Dog,'" *Times*, Mar. 21, 1910, p. 12 以及 ADAVS 同卷所轉載之眾多媒體報導。



這結合了遊行與戶外集會的群眾策略，實可謂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各項策略之集大成。不論是由遊行、車陣、旗幟圖像設計等元素所共同創造出之美學效果，或是此些新奇元素以及女子遊行與演說所可能吸引之媒體注意等，都無疑落實了該運動在這大眾時代所致力達至之「最大宣傳」的整體策略。¹²²RDS雖然不斷企圖利用媒體將此類策略呈現為一訴諸情緒、非理性、扭曲簡化複雜科學知識與程序的「愚民」策略，¹²³但無可諱言的是，自1902棕狗之死，至1910年之銅像移除及其後之盪漾餘波，反動物實驗運動一步步之激進策略，成功地替反動物實驗運動做了最大宣傳。部分團體如BUAV雖無直接涉入棕狗事件之各項爭議，但亦承認在一系列棕狗暴動後，媒體對動物實驗議題之關注，使其會員數有了自其成立以來最大成長。¹²⁴ADAVS也統計自棕狗銅像被移除後，其所展開之一系列遊行、演說與店鋪宣傳等策略，使其會員數增加了約五千人。¹²⁵

當然，媒體之關注、會員數之成長，未必代表著運動之勝利。許多非關策略之社會轉變，都讓反動物實驗運動於此時暫時受挫，例如1911年自由黨所通過之「國家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其中有關醫療研究之條款即可謂一關鍵因素。此保險法創造了一個由國家資助的「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mmittee,後改名為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來推動醫學發展，形同由國家出資贊助動物實驗。這無疑是對運動之重大打擊，也讓運動再度展開激烈抗議，BUAV亦領導運動再度走上街頭，¹²⁶可惜此一國家與科學研究之日趨結合，

¹²² "Brown Dog procession," *Anti-Vivisection Review*, 2 (1910-1), p. 284.

¹²³ "Anti-Vivisection Processions," *Times*, Jul. 9, 1909, p. 4.

¹²⁴ Sir Frances Channing, "Anti-Vivisection," *Times*, May 15, 1908, p. 12.

¹²⁵ *Anti-Vivisection Review*, Sept.-Oct, 1911, p. 31

¹²⁶ Hopley, *Campaigning against Cruelty*, pp. 24-5.

終非運動所能阻擋。

反動物實驗運動，一方面既難以推動全面廢止動物實驗之目標，另一方面，部分團體已推動多年的禁用犬類於動物實驗之犬隻法案原本於 1910 年代初頗有通過國會立法的可能，亦因一次大戰之爆發而終止討論。然而，戰後當運動團體再度重整旗鼓時，醫界亦同樣積極動員，在MRC、「英國醫學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及RDS的帶領下，展開國會遊說和大眾宣傳工作。更為關鍵的是，由政府贊助之狗瘟疫苗於 1920 年代後期之成功研發和不斷改良，再加上動搖眾多愛狗人士的「動物實驗亦能使動物受惠」之說法，終於讓輿論逆轉，扼殺了犬隻法案的成功希望。¹²⁷於此之後數十年間，醫界一次次的重大研究進展，如盤尼西林、胰島素之發現及肺結核、梅毒和熱帶疾病等重大疾病於治療和預防上的突破，似乎都帶給動物實驗運動不小之中挫。然而，動物實驗之效益，顯然並非此一議題所牽涉之唯一面向與最終解答，更非許多反動物實驗者之終極關切。或許因為如此，時至今日，我們依然面臨著動物實驗所帶來之重大道德挑戰，而環繞著棕狗之傳奇，似乎已成為此一道德爭議之重要象徵，只要此一爭議依舊延續，棕狗也將持續被傳頌、紀念，乃至批判與嘲諷。

1985 年，在原銅像消失 75 年後，另一個棕狗銅像再度在 NAVS、BUAV 以及支持大眾的共同贊助下，重新豎立於貝特希公園內，凝視著另一個世代的人們。有關棕狗之故事，顯然尚未終止...

六、結論

九零年代，我初至英國，隨即注意到了一個迥異於台灣、對於動物倫理議題高度敏感之異國文化，各地報刊媒體、書籍雜誌、學校社團及社區團體，充滿了各種動保議題之討論。走在倫敦地鐵，沿著地鐵電樓梯扶搖而上的壁面和站外牆面所張貼的，經常是讓人不忍卒睹的小獵犬實驗慘況之大小海報或貼紙。每至假日，活絡的廣場與市集上，也總不缺少運動團體的宣傳攤位，提供各式圖文並茂的文宣供人取閱，而攤位周圍所懸掛的，不外是能帶來強力視覺震撼效果之被虐或被實驗動物照片。此外，動保團體和媒體也不時聯手揭發實驗室中不為人知之動物虐待情事，如「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透過秘密調查，於 1997 年揭露了此時歐洲最大的動物實驗公司「杭亭頓生命科學研究機構」(Huntington Life Sciences) 的許多違法實驗程序，包括實驗人員對動物之蓄意毆打與戲弄，以及BUAV人員於 2000 年潛入劍橋大學之腦部研究實驗室後所揭發之對長尾猴的虐待。這些不斷被揭露之動物實驗真實狀況，往往能獲取媒體大幅配合報導，引發輿論熱烈討論，也帶動全國各地的大小街頭遊行與抗議行動。¹²⁸

我們若將二十世紀初環繞著棕狗事件運動所使用之策略與當代運動並置，不難發現甚多相似元素：秘密調查、運動與媒體之結合、視覺宣傳之運用、公共空間中之攤位設置、戶內外大小型集會與示威遊行等，當然，還有女性已不再缺席的演說場合與街頭遊行；只是，這一切皆已稀鬆平常，成為英國動保文化之一部分，不致引發任何異樣眼光或評論了。

回顧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之媒體、美學與群眾策略，並將之置於此時之大眾社會文化以及激進政治傳統，尤其是激進派女子普選權爭取運動之發展脈絡，我們亦可見到，相對於十九世紀，運動於策略上之突破與激進化現象，乃是運動團體針對時代環境所做出之適度回應，亦是運動在對其它激進運動文化之密切連結與熟稔狀況下，所展現之高度策略理性。這顯然並非一群心結重重、非真正關心動物福祉者之情緒宣洩，如蘭絲伯利之將棕狗事件視為婦女與工人潛意之作祟，並以之解釋運動之注定失敗。相對地，當我們將分析焦點放在運動之策略運用面時，我們不得不指出，這似乎是一群充滿高度戰鬥力並且充分掌握時代政治變遷、物質文明資源以及社

¹²⁷ 參閱 E. M. Tansey, "Protection against Dog Distemper and Dogs Protection Bills: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nd Anti-Vivisectionist Protest, 1911-1933," *Medical History*, 38 (1994), pp. 1-26.

¹²⁸ 有關Huntington Life Sciences所引發之一系列爭議與BUAV之秘密調查行動，參閱http://en.wikipedia.org/wiki/Huntingdon_Life_Sciences與<http://www.buav.org/undercover-investigations>. 2011/05/15點閱。

會運動策略曲目之積極改革者。而棕狗這在一偶然歷史機緣中讓人們所見證到的動物生命，在運動者眼中，似乎除了是一文化符碼，象徵他們所心繫之無數受苦動物，更是一最佳宣傳利器，帶動了二十世紀初反動物實驗運動新一波的高峰。